



以象征传统的“国学”与象征现代的“现代性”
两个问题域来概括中国现代学术与思想的主脉，
正是为了证明这两者从来就不是“对立、对抗”的关系，
而恰恰是彼此之间的“融通”与“互衍”，
才能建构起中国现代学术与思想的基本知识格局。

现代性 与“国学”思潮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代性 与“国学”思潮

贺昌盛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性与“国学”思潮 / 贺昌盛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495-3187-5

I. 现… II. 贺… III. 学术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IV. B2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584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望州路 251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50 千字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	---

上 编

现代“国学”:命名及其功能	9
语言、民族国家与“国学”形态的内在构成 ..	24
国学院体制与现代中国学术的知识聚合	39
国学何为: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国学热”问题论争综述	56
现代中国“文学”学科的建立	69
载籍·考据·立论	
——现代中国学术的方法论转换	85

下 编

现代中国文学与启蒙理念的逻辑关联	99
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110
钱锺书早期的“异国形象”研究	
——《17、18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及其他	
.....	149
闻一多与鲁迅比较研究论纲	167
现代思想的抉择	
——新儒家与自由主义之争	177

《自由中国》的刊行与台湾自由主义思潮的演进	193
-----------------------------	-----

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文学的现代性诉求 ——以《自由中国》“文艺栏”为中心 ...	205
--	-----

附 录

知识人的志业抉择	254
----------------	-----

作为殖民话语的“国民性批判”	272
----------------------	-----

文学交流研究的“形象学”视野	278
----------------------	-----

日本人对现代中国的解读(译文)	283
-----------------------	-----

后 记	295
-----------	-----

导论 “国学”与“现代性”的对话

学术史研究是近年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但学术史描述不能单纯地停留于一般学术史实及代表性学人成就的概括性总结的层面上。为学术史上所出现过的诸多范畴概念作明确的定位,应当是学术史研究的首要前提,缺乏了这一基本前提,学术史研究必将处于含混、模糊乃至充满误解的境况之中。近年来屡屡发生的有关“国学”、“文学史”、“启蒙”、“现代性”等方面的论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国学”和“现代性”问题是笔者近年来一直关注的两个重点。就已有的讨论而言,这两者似乎原本属于水火不容的两极,但追根溯源我们就会发现,事实绝非如此。这里以表征“传统”的“国学”与表征“现代”的“现代性”两个“问题域”来概括中国现代学术与思想的主脉,正是为了证明这两者从来就不是“对立/对抗”的关系,而恰恰是彼此之间的“融通”与“互补”才最终建构起了中国现代学术与思想的基本知识格局。从“国学”和“现代性”这两个最为核心的“知识基点”出发来重新观照中国现代学术与思想的演化历程,有利于形成更为清晰的“知识”构架。笔者以“知识还原”的研究策略为向导,从“国学”与“现代性”这两个核心“原点”出发,对其基本的知识构成给予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细切梳理,希望以此为基础来重新观照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演化轨迹,并进一步明确“国学”与“现代性”范畴及其所统摄的“文学”、“启蒙”、“政治”、“审美”等作为内核的诸多“知识元素”本身的特质、意义、变化与影响。

“知识谱系”研究的优势就在于,其“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有利于避免思想层面的偏向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干扰,以使“知识描述”本

身尽可能趋于客观。“知识还原”的研究策略类似于现象学之所谓“价值悬搁”与“现象还原”，其虽得自于福柯等“知识考掘”研究的启发，但实际上，或许与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载籍”、“考据”等方法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在方法论层面上实存“会通中西”、“接续传统”的探索之愿。

著中所论分上下两编以示“分界”与“对话”。上编侧重讨论“国学”的学术渊源、知识统系、学术属性、方法论转换及其在认识层面上的解释误区；下编则以“现代性”研究为中心，在概要性阐述“现代性”理论的一般“知识”内涵的同时，选取鲁迅、闻一多、钱锺书及新儒家、台湾文学等个案，以拉开“历史(时间)距离”和“区域(空间)距离”的方式，具体展示“现代性”在“文学”领域内的不同表现，以此显示其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知识建构”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国学”是近年学界争议最大的一个领域，但仔细分析其相关的讨论后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论争都忽略了“国学”自身最为基本的学术内涵与现代性品质。“国学”之称最早来自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人的倡导，其本身就是为了配合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出现的新兴学术形态。“国学”首先意味着“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这与中国传统学术中以“君学”为核心的王朝体制形态的“经学”已经有了本质的差异。“国学”在其演化过程中，历经了“国粹”、“国故”，再到“国学”的一系列变化，逐步获得了“地域所属(Country)”、“政权体制(State)”及“民族种姓(Nation)”等多重层面的本质规定，同时也与西方“汉学(Sinology)”形成了同步发展的学术呼应。所以，“国学”既然是中国现代性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就理应被视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统称范畴，而不应被简单地看作传统“经学”或“儒学”的复活。“国学”与中国传统学术之间不是简单的“学术延续”的问题，而只能是在汲取传统学术之合理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民族学术的问题。有此定位，我们才能真正摆脱当下中国学术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乃至最终彻底丧失民族学术自信心的尴尬境况。

“国学”的知识建构源于西式“学术分科”原则下形成的学科分类，学科分类的引进在表面上似乎只是学术研究内部的调整，实际上

却意味着“国学”系统本身对现代“知识”系统的全盘接纳；传统学术以其对“道统”、“政统”和“学统”的相继承递构筑起了一个封闭的独立统系，“国学”对这一统系的“知识化”分解恰恰打破了传统学术的封闭性。“知识”的构成源于“科学”，而“科学”的根基则是“理性”，这正是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国学”系统的“知识化”转换不仅意味着一个新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更意味着“学术”自身之“主体”地位的确立；如果说在传统学术的那种“政—学”一统的体制规范中，学术只能依附于政体的话，那么，正是因为“国学”这一“共名”的出现才真正使学术的独立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的最终“定名”不仅凝结了近现代学人力求打通古今、中西的共同学术取向，更显示出了中国学人重新整合传统学术以期与世界学术沟通并举的勇气和信心。

既有的“国学”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学术资源。比如章太炎和胡适等人在“国语/国学”问题的讨论中就已经透露出了“现代性”问题域中对于“语言/民族”意识的高度重视，章、胡虽分属旧、新两派学人，但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载籍”、“考据”等方法却同样情有独钟。章太炎承续汉学是为了“追溯”汉语的“正源”，试图以复活汉民族早期的“原初语言”形态的方式来重新构建汉民族文化的精神谱系；胡适所认定的“国语”却首在“语言”的“革新”而非“复古”。章太炎试图“以正言”来“明正道”，其“国学”诉求的背后隐含的仍然是“言/道”一致的理想。胡适则要求“以新言”来“明新道”，特别强调所谓“国语”并不是某种“现存”的语言，而是需要重新“创制”的全新的语言；其“整理国故”也不是为了“恢复”汉民族的既有精神品质，而是为了在全面总结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再造文明”。具有现代意味的“知识(者)集合体”——“国学院”的出现，不只是导致了“知识”之服务对象的转移——知识资源已不再是当政者的专有品而成为全体国民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平台，它同时也使“知识”本身不再是传统“士人”的专利或进阶工具，而日渐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真正展开“思想”与“学术”研究的核心载体。以现代中国“文学”学

科的确立为例,中国传统学术形态中从来就没有“文学”的独立学术地位,虽然在清中叶以后出现过桐城学术之所谓“词章”、“文章”研究,但这类研究一直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的。“文学”作为学科的真正独立源于1921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建立,迄今尚不足百年,但恰恰是在“国学”这一知识统系中,“文学”才在“审美(感性特质)”、“时间(文学史)”、“空间(域外或国别文学)”及“科学(文学理论与批评)”等维度上确立了属于自身的有着明确“现代”意味的独立学术范畴,也因此形成了后世“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国学”诞生之时的学理建构与思想取向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后世“中国学术”的基本“知识序列”与学术路径,而追溯这一历程,并深入地剖析蕴涵于其中的诸多核心“知识元素”,将更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民族学术”之知识属性与学术品质的深切理解。

“现代性”话语本源于西方,而由“现代性”所衍生出来的“启蒙”、“现代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想元素”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重要知识内核。但中国的现代性发展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却同样是中国学界争论的焦点。在笔者看来,就中国的具体情形而言,“国学”与“现代性”或许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各执一面的同时,我们大概已经忘了“一体难分”的基本道理。

“启蒙”作为“现代性”范畴的核心“知识话语”,在进入汉语语境之后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启蒙”原初的涵义为“自我反思”,所以,其真正的向度是“指向自身”的,但在汉语语境中,这一“内向”性的结构已逐步被转变成了一种“外向”性的结构形式,即“启蒙”所显示的“自身/自身”的对话结构被转换成了“自身/他者”的“教化”式对话结构形态。由此才形成了“独立个体的解放→整体社会的解放”与“整体社会的解放→独立个体的解放”两种取向共在并举的“逆向双轨”的中国式“启蒙”模式,前者强调的是每个“个体”的自觉应当成为整体社会普遍自觉的前提,而后者则主要突出借助于整体社会的革命性变化来达到解放每个“个体”的普遍效果。由此才导致了现代中国学人在学术、思想、文学及政治实践等诸多方面的分歧与误解。从

“知识还原”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明白,“启蒙”的要义正在于使人在摆脱了那种单一的以被动服从为前提的“蒙昧”或“不成熟”状态之后,真正进入到探询和体察人的精神蕴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层面上去。“启蒙”在“理性”维度上规定了思想本身的绝对自由,同时也规定了对思想自身加以反思和批判的责任之所在;而在“人文”维度上,“启蒙”则要求从根本上完成从“神本/君本”时代对于“神性”的无条件臣服向“人本”时代对于“人性”本身的批判性审视的转换。所以,“逆向双轨”的模式非但不应该形成“对抗”,反而需要走向“对话”,因为“启蒙”本身就是一种“分界”,它是居于“蒙昧”与“祛魅”之间的一个界线。这里的“蒙昧”到“祛魅”也同样不能被看作能够一蹴而就或被根本解决的某种一劳永逸的静态结果,而只能被看作“蒙昧/祛魅”与“新蒙昧/新祛魅”的“自否定”结构中不断上扬的动态过程,由此才能真正保证“知识”与“思想”本身的“可持续性”。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来看,现代性正是“启蒙”思想的必然归宿。现代性继承了启蒙运动所灌注的理性、乐观、进步的精神特质,并借助其对自身合法性的不断巩固,成为大幅度推进理性与科学以引领人类迈向一个可操控的现代世界的核心动力。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却也同时导致了一种理性技术化、利益至上、人性异化、情感淡漠的社会景观的出现。现代性本身是一种“历史(理性)现代性”与“审美(反叛)现代性”相互制衡的话语形态。现代性的持续发展其实是在为“现代人”提供着不断创造和不断抵抗的双重生存模式,它既指示着人在远离神性的庇护之后可以借助其自身的力量从现实理性达至自由心灵的路向,同时也指示着由于人类拒不承认自身与世界的有限性而努力将其潜能发挥到极致时不可避免地堕入深渊的危途。借“言说”以“呈现”这种双重生存图景可以看作“现代”的文学书写最为核心的任务。

那么,中国的现代性发展是否就真的意味着必须与“西方”及中国自身的“传统”始终处于对抗、否定乃至彻底决裂的状态呢?从“知识”本身的延续、增殖、转移与变形等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恐怕同样需

要重新加以全面而深入的审视。作为一种全新的“知识范型”，“现代性”话语已经渗透了哲学、历史、文学等学科的方方面面，中国的现代性如何在“中西古今”之间合理而有序地展开，一直是中国学人所关注的焦点。钱锺书早年曾以“17、18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为对象，深入剖析过西方现代性的确立过程中对于中国形象的扭曲，以及“西方中心”意识本身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强势殖民”意味。20 世纪 50 年代发生在台湾的“新儒家”与“自由主义”的激烈论争，同样也贯穿着“传统”与“西化”之择的焦虑与困惑。而 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文学的特定境遇与演进形态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独特而复杂的“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共生并举的现代性景观。这类个案在表面上似乎是孤立存在的，但从学术与思想的“知识”建构角度来看，它们其实都是立足于共同的中西、古今的“知识”背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共同审视着“现代性”这一核心问题。钱锺书的发现是在综合了中国传统学术之“考据”方法与西方“新批评”对于“意义”的追溯等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的，其所显示的正是“中/西/古/今”的有效“会通”。徐复观与殷海光等人的论争，其最终的目标实际也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即他们都是以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作为其思想的公共前提，新儒家早已脱离了晚清时代的那种孔教式儒学的封建性土壤，而自由主义者也没有把新儒家看作拒绝一切现代意识的封建余孽。20 世纪 50 年代的台湾文坛虽然发生过“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之间的激烈对抗，但同样最终在“中/西、古/今”的汇流中演绎出了汉语文学的独特风采。

作为特定“知识形态”的学术与思想，总是在不断的对话之中才得以磨合、建构、丰富和发展的。“国学”和“现代性”可以看作构成现代中国学术与思想的两个核心基石（或称“知识支撑点”），以此衍生出来的诸多“知识元素”都需要我们重新给予深入而细切的研究与辨析。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才有可能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学术与思想的真正面貌，同时也才能切实地为未来学术与思想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学理依据与知识参照。

上 编

现代“国学”：命名及其功能

“国学”之谓始于何时有多种说法。余英时曾提出“国学”概念传自日本，姜义华也考证认为，“国学”之称本源于日本江户和明治时代的“古学”复兴，后世中国学人借称转指乃有“国学”之谓。^①能够相对取得共识的意见认为，这一名称的由来可能初见于章太炎在日本组织的“国学讲习会”及刘师培所发起的“国学保存会”，但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刘师培，都不曾对“国学”这一概念给予明确的界定。钱穆有云：“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②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国学”从出现到基本为学界所认可，确实肇始于20世纪初期，而绝非中国传统学术所固有。整个“国学”系统也同样是在历经了确认学术与国家的关系、重建学术的自觉意识及全面接纳现代“知识”体系这样三个过程之后才最终得以建立起来的。

一、“国学”的国家特性：国粹、国故与国学

中国传统学术，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其学术本身一直都是依托着“政—学”一体的结构模式而演进的，这当然与中国传统的“学以致用”

① 姜义华：《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上）》，《学术月刊》2007年第7期。

② 钱穆：《国学概论·弁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页。

仕”的体制规定性有关。传统学术发展到清末,最大的变化就是在“西学”的强势冲击下,旧有学术日趋式微,大有随清王朝的没落而全面倾圮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自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左右,中国学界爆发了以“学术何为”为核心的所谓“国学之争”。

何谓“国学”?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国学之名,始见于章太炎之国学概论,前此未之有也。论其范围,则我国固有之学术,无不毕容。”^①1904年(光绪三十年)刘师培等人组织成立“国学保存会”并于次年创办《国粹学报》,宗旨均明确表述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国学”一语的起源确乎出自章太炎或刘师培,这一点当属定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清季一代学人在学术观点、研究方法或学术立场上有着怎样的差异,其在自身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之前冠以“国”的称号的意愿却是完全一致的。章士钊即直言:“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②钱基博认为:“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勿自暴也。”^③郑奠也强调:“诚欲爱国,宜知国学英华之所存。诚爱真理,亦宜知本国学术之精义。”^④顾实有言:“海禁洞开,外患荐至,精神文明失其抗拒力,物质文明闯入而横行。于是复有‘中文’、‘西文’、‘中学’、‘西学’相对抗之名词。最近国家观念普及于人人,凡若‘国文’、‘国语’、‘国乐’、‘国技’、‘国粹’、‘国故’、‘国货’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不胫而走,有口皆碑。而‘国学’一名词亦哇哇堕地而产生。……今世万国者,一周季列国之放大也,其治学俱不能不有‘时间’、‘空间’之观念者势也。”^⑤从纵向维度上看,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所发生的种种学术论争,诸如“汉宋之别”、“有无之

① 李冷衷编述:《国学常识述要·弁言》,北平:众教学会,1934年,第1页。

② 章士钊:《国学讲习会序》,《章士钊全集(一)》,台北: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③ 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页。

④ 郑奠:《国学方法总论》,洪北平编:《国学研究法》,上海:民智书局,第5页。

⑤ 顾实:《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一集)·序》,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4-5页。

辨”、“性理之争”等等，大都被限定在“学术”范围之内，而很少有人会自觉地将“学术”之于“国家”的功能和关系纳入到需要争辩讨论的层次上去加以探究。传统学者所秉承的学术责任基本无外于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既有规定，但恰恰是在清末至民国的这种既面临社会体制的根本转型又掺杂着内忧外患的复杂社会背景中，学者与学术之于国家社会所应具备的功能和价值才被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并最终演变成一个全体学人必须面对的、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于日本筹办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兴社时即明确表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①“国粹派”的许守微也强调说：“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②认定“学术”的兴衰与国家的存亡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也许是晚清学者较之中国传统文人较为深刻的变化之一。

清季民初的“国学”论争历经了从“国粹”到“国故”，直至定名为“国学”的一个过程。认“国学”为“国粹”主要出自晚清“国粹派”学人，沈庆侠曾回顾说：“海通以后，人尚西学，束旧籍于高阁，罗新简于宏榭；于是一般不能研数理、读外国文之徒，大声疾呼，以保存国学相号召，曰：‘国学者，国魂也，国命也。非此不足以立国也；保此实所以保国也。’其言之不合理论姑弗问，至国学一词之创，实不得不谓出此辈之手。”^③马瀛也曾指出：“光绪中叶，海内学者，虑中国固有学术，因西学之侵入而式微也，群起而保存之，于是遂有‘国粹’之名。然中国

① 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1905年。

②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1905年。

③ 沈庆侠：《国学常识》，杭州：长兴信记印刷公司，1933年，第2页。

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天壤间之精英，则国粹之名，容有不当。”^①将中国古典学术一概称之为“国粹”既有顽固守成之嫌，更不合于多数学人的心理诉求，所以“国粹”一语很快就被章太炎提倡的“国故”概念所替代，“以国学为国故，较之以国学为国文、国粹，当妥帖多矣”。^②胡适也曾辨析说：“‘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很多。……如果有人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③也因此，直到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并创办《国学季刊》之时，胡适仍肯定地表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④

从“国粹”到“国故”再到“国学”，多数研究者主要强调的是这一演进过程中不同派别的学人在新旧、古今、中西等二元对立式论证结构中所处的立场和态度的差异，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整个论争的过程中，那个被不断重复的“国”的蕴涵已经悄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许正是这种变化才是导致在“国学”论争中产生不同分歧的内在原因。

汉语语境中的“国家”一词其实是一个非常含混的范畴，既兼有“地域所属（Country）”之意，也可作“政权体制（State）”的符号，同时又与“民族种姓（Nation）”密切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章太炎、“国粹派”，还是民初的各式新派人物，他们所讨论的“国学”之“国”实际上一直都在各自不同的语义层面上滑动。大体上说，民国建立以前，人们所讨论的“国学”主要是在“地域”与“种族”双重意义上展开的，比如，“国粹派”的黄节所强调的即是“有是地然后有是华”的“地域”观念，而邓实所界定的“一国所自有之学”则含有“地域”和“种族”两个

① 马瀛：《国学概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第2页。

② 沈庆侠：《国学常识》，杭州：长兴信记印刷公司，1933年，第5页。

③ 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东方杂志》第18卷第16期，1921年8月25日。

④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2卷第1号，1923年1月。